



莞渭小学两题

陈连清/文

其一 师者如苇

前年，我与莞渭小学周冬青老师之子即温岭市第二中学的林老师通上了微信。得知周老师如今住在老家琛山，身体硬朗，已过百岁华诞，我既欣喜，又泛起了对莞小老师们的眷恋。

在我心里，莞渭小学的老师们是最棒的，他们如同一幅群英谱画像。他们一个个排列起来，就像那条通往莞小的小河，绵长而清亮。

1962年秋季，我迈入小学的校门，迎面而来的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陈连芳。

一年级时，我班教室后面不远处是厕所，下面是石板砌成的池子，上面有个木头架子，偶尔会有小同学不小心掉进坑里。一天，一个小同学如厕时没抓牢边沿，“扑通”一声掉了进去。陈老师闻声赶到，推开架子，弯下身去，一把将那小同学拉了上来。小同学满身尿粪，陈老师也沾了一身。陈老师把小同学拉到围墙边的水井旁，用井水从上到下冲了又冲。井水冲刷污秽的痕迹，恰似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的纯净银河。洗完澡，陈老师又把他带到自己的寝室，脱掉他的衣服，用被子盖上，因为已是深秋。这种场景又臭又脏，一般人未必敢靠近，但陈老师却义无反顾。

刚入学时，许多小朋友在课堂上想小便又不敢说，等不到下课就拉在身上，我也经历过一回。有一次我想小便，开始忍着，想告诉老师又怕受批评，实在憋不住就“嗤嗤”地拉了出来。开头一阵滚烫，过了一会儿透心凉，地上是一摊尿液。我怕老师发现，把头埋下来贴在桌上。不料被陈老师炯炯的目光扫到了，她径直去厨房拿来一畚箕的稻草灰，打扫完“战场”后，叫我快回家去处理。我的脸涨得通红。稻草灰吸尿的“滋滋”声，是我最早明白的物理现象。教育最动人的场景，往往发生在尊严与狼狈的交界处。

周冬青老师教低年级算术，她个子小却精灵，我们初级的四则运算技能是她教会的。去年整理旧物，我发现周老师送我的算草本都还完好保存着。

教导主任叶西林是我五、六年级的语文老师，他个子高高的，一副高度眼镜后面转动着睿智与慈祥的目光。临近毕业，叶老师要调去横峰小学任教。临行时，同学们依依不舍，将他送至学校的后门，目送他一步步离去，直至他的背影消失在“关庙堂”桥那边。我眼里噙满了泪花，泪花中尽是他矫健的身影。

一年暑假回来，我们听到蔡宗连同学溺水身亡的消息。体育老师潘琳衡立即制订游泳学习计划。小河边人声鼎沸，笑声响亮。经过两个暑假的训练，旱鸭子都变成了“浪里白条”。门前的清流，无声地流淌着潘老师对学生的脉脉深情。他吹哨的节奏，暗合着《诗经》的韵律。我们毕业了，潘老师因转不了正，回老家去了，把哨声永远留在了河岸。

美术老师兼辅导员潘相甫老师，凭借一支粉笔可以让牡丹花、玫瑰花在黑板上盛情绽放。还有杨文声、狄敏伯、郑福根等老师，他们都让我难以忘怀。狄敏伯老师总用报纸包作业本，某天我拆开看见头版“亩产万斤”的报道，正盖在我写错的“实事求是”造句上，这竟成了我的批判性思维启蒙。

我们毕业后，有的老师调回原籍了。教育的蒲公英终将随风四散，落在御榻的成为《尚书》注脚，坠入粪坑的反倒长成野生的《诗经》。多年后在故宫看见“岁寒三友”纹样的官窑瓷片，我明白了那些坠入粪坑的桃花，何尝不是另一种青花坯子。

那些岁月，我们如同盐碱滩的咸青草，在老师用脊梁撑起的荫蔽下进行光合作用。老师对学生的爱是深沉而无私的，是母性的。回头看今日，当AI批改的红钩覆盖了朱砂温度，我看见陈连芳老师蹲在井台的身影正被编码成0和1形式的云端数据，而真正无法解密的，是那些与粪便、尿液、粉笔灰发生化学反应后，永远沉淀在教师骨血里的教育碱基对。

多年后读《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我才懂老师就是水边的芦苇：空心守节，根扎淤泥，却把花穗举向教育的天空。

其二 小学同学也难忘

“小妹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白居易的《池上》，正是那些年我们莞小的同学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打闹的写照。

那时的莞小，教室墙上还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而我们真正学会的，是如何在课桌下偷偷交换一颗糖。

每天上学，童达森定会经过我家门口，经年累月，风雨无阻，因为经过我家路途更短。高年级和初中时，我们又共同爱上了笛子、二胡和草医草药，一有空就去采草药、吹笛子、拉胡琴，一路上呢喃细语，笛声悠扬。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彼此都把故事放在心中。命运的货车碾碎草药图谱那日，童达森的血渍在柏油路上开出最后的莲花。

家住桥头王自然村的同学王梅青，常约我去他家玩，要么做作业，要么去野外玩耍——掏鸟窝、捉蜻蜓、打泥鳅。玩得忘情了，梅青常留我食宿。他母亲往往天色未明就起来为我俩做饭，这晨曦里的灯光常常在我心中亮起温馨。春天的一个下午，梅青约我去后门岸渭渚拔油草。在绿油油的苜蓿田里，他很快填满了草篓。我拔油菜不是他的对手，尽管拼命追赶还是落后一大截。梅青一看我的草篓还没满，就转而帮我拔。

2023年3月28日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李福明病逝上山的日子，我踏着唢呐声去送他最后一程。葬礼上播放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突然卡在“爱祖国爱人民”那句。蔡冬生向我挥着颤抖的手。当彼此逐渐认出对方时，两双粗糙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转而又觉得好像一直不曾分离过。

一、二年级，也就是九岁十岁光景，是混沌阶段，男女同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到了三年级，男女同学有了“分别心”。有位女同学从穿着到体形，从表情到动作，从外表到智慧，都很养眼，是万绿丛中飞舞的一只彩蝶，有的男同学喜欢多看几眼。性别意识的觉醒如紫云英的初绽。

在读小学时，我与许多人期不期而遇，我与他们的交往、对话是愉悦而舒坦的。同学群里有人分享AI修复的老照片，那些像素重组的脸，比记忆里的更清晰，却再闻不到当年油墨试卷上混着鼻涕味的蓝墨水香。

门前的小河依然倒映着六十年前的天空。如今站在岸边，看外卖骑手掠过扬起的尘埃，我就会想到，当年追逐的何止是蜻蜓，更是被时代暗流裹挟着漂向的各自无法返航的彼岸。当数字技术复刻校园时，唯有河水固执地保存着1962年的分子结构。

小城琐忆：写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莫爱蓉/文

这是我第四次站在北山头（原箬山镇东湖村）的古旧厝院中，举目凝望灰白斑驳墙上还算清晰的“MY DEAR HOME”三个英文单词。

这是八十年前几个热血青年留下的英文，如今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故事。“MY DEAR HOME”——我亲爱的家，它承载着八十年前多少人的血泪与欢喜啊。

古厝的主人告诉我，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箬山时，饱受战乱之苦的箬山人奔走相告。他们用鞭炮铺满箬山的大街小巷，以喧天的鞭炮声宣告胜利的欣喜。古厝里几个在椒江求学的青年学生回到家，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份激动与欢欣。他们爬上梯子，在自家大院的墙上用水泥雕下“MY DEAR HOME”这几个英文单词。

“MY DEAR HOME”——它是青年学子多少难以言表的情怀：我亲爱的家，我美丽的家，我热爱的家，我蒙受苦难的家园，我可以自由呼吸的家，我至亲至爱的祖国。

古厝的主人还告诉我，日本人在箬山空袭、劫掠渔船，登陆后杀人抢劫。

我的舅公

我从未见过我的三舅公，我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只有我外婆可能见过他几面。我从外婆那儿听过有关舅公的只言片语。外婆说舅公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弟弟，是她

沈家门小妈的第三个儿子。他从小天赋异禀，胆大能干，十五六岁就能替父亲掌管船队，运载货物从沈家门往返于各渔港，最远到达台湾基隆。

舅公十八岁那年，船从沈家门港口出发前往箬山，没来得及上岸就遭遇日寇劫掠，人船皆失。只有一个伙计侥幸逃生，回家告知家人噩耗。

提起舅公，外婆总是边抹泪边说：“人和船都没了，我小妈疯了，我阿爸从此就住在沈家门照顾她，没回箬山了。”

“人和船都没了”，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是舅公留在人世最后的信息。我不敢想象他是怎样被日寇戕害的，或许他曾义正词严地抗争，或许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杀害，或许他遭受过非人的折磨。船呢，是被强抢了，还是被烧了？我无法从这简单的六个字中得知。

年仅十八岁的舅公，刚开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这样罹难，怎能不让人哀恸啊！

我的祝愿来得太晚，舅公。但我还是要说，愿您曾魂归故里，愿您曾与太太太婆在天堂相聚，愿您早已投胎到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

日军轰炸箬山街道

箬山老街道，从老胜海村到老东湖

大河之子

舒宁晖/文

当接过老梁递过来的一块A4纸大小的薄木板时，我疑惑地辨认着木板上斑驳的肌理和暗淡的色彩。“这是一幅油画写生作品！”我惊呼。

“是我父亲当年从日本带回来的，仅有一件。”老梁平淡的言语无法抚平我难以抑制的激动。老梁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温岭第一任县委书记梁耀南。80多岁的老梁，谈到他的父亲时，情绪是平静而克制的。

1930年夏至1931年夏这段时间，梁耀南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留学日本“川端画会”深造。这幅木板画所描绘的是一名身着深灰色西服的男子和一名着紫色和服、盘发髻的女子在野外郊游的景象。画作中粗犷的笔触和明亮的色调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印象派风格。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印象派战胜古典学院派后成为主流，并逐渐影响亚洲。“川端画会”是20世纪初至抗战开始这段时间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印象派油画的两所主要学校之一，另外一所是李叔同、刘海粟等大家求学过的东京美术学校。深得时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赏识的梁耀南，被推荐赴日求学，以获得艺术上的更高提升。

站在金清港畔这间百年木楼前，再看手上这件油画作品，我如梦呓般自语：“我此刻是站在一位画家的故居前吗？”

“这样就安生了。”老梁淡淡地回应。

但是，梁耀南的一生注定是不安生的。梁耀南去世时，老梁年仅三岁，关于父亲的生平，他基本是从母亲和父亲战友的口中获知的。

梁耀南的出生地滨海镇汇里村（现金闸村），是温黄平原的母亲河——金清大

港的拐弯汇流之处。金清大港蜿蜒百余里，滋养了百万生灵，也会泛滥祸及两岸。历史上，因自然灾害引发民情激变的事件不在少数。“一八四八年七月初五，平地水高八尺许。求官开闸未成，五万余人持锄往毁金清闸坝”；“一八五一年夏，大水，乡民往毁环金清闸坝，守备率兵往捕，民多落水死”；“一八五六年五月，大水，金清闸不开，水乡聚众数万前往掘坝毁闸，闹外人聚众拒之，枪炮轰鸣，死者数十人”。因灾害导致的苦难磨砺出了这些乡民深入骨髓的不屈精神，该地的历史就是一部乡民的不屈抗争史。

祖辈生活在金清港畔的梁耀南虽然不是最底层的乡民，但他深知乡民疾苦。我猜度他是带着基因里流淌的不屈精神，为乡民寻求活路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843年初，马克思在摩泽尔河畔写下《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时，他也是深知摩泽尔河两岸民众疾苦并为之高声疾呼。

但老梁自有他的不同理解。虽然地处常被大河泛滥所淹没的贫瘠之地，但当时的梁家过的是吃穿不愁的小康生活，也有足够的财力供家里的两个儿子离乡求学。大哥梁耀东在临海省立第六师范读书，梁耀南则就读于临海省立第六师范附小。梁家期待着两个儿子在新学堂学有所成，像父辈一样在政府谋得职位，延续富足安稳的生活。但平坦顺遂的求学之路，注定不是梁耀南的追求。1926年，梁耀南在临海省立第六中学读三年级时，受革命思想影响带头参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在就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期间，梁耀南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在鲁迅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活动。在此阶段，他的内心已经被革命思潮灼热。1931年夏结束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决然投入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村，长度超过两百米，分为街路头、中街、街路尾三段。1941年前，街路两旁基本都是两三层楼房，店铺林立，热闹非凡。

1941年春，日军空袭温岭，飞机在箬山街路上空投掷炸弹，中街火光冲天，人员伤亡不少，店铺毁损殆尽。大姐说，解放后，曾有人多次到中街哭泣祭拜，他们的家人多数因空袭身亡，家道败落。如今，街道一侧是重建后的胜海大队石屋，另一侧则是一块空地，昔日街坊的排屋已不复存在。我多年行走在箬山的街头巷尾，观察过多处大厝，它们基本建于抗战前，战后再无大厝修建。

1941年4月19日，日军凌晨从箬山登陆，攻占温岭。

外婆说，日本人登陆后，把老东海村民集中起来，杀害了几人后离开。从史料中了解到，这是抗战时期浙江沿海的一次重要战役。日军没有在箬山大规模屠杀，是因为他们要向内陆快速推进。但他们在松门、沐川等多地大肆杀人放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是温岭现代史上重大的灾难之一。

今年是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看着“MY DEAR HOME”，我心依旧不能平静。我忘不了外婆泪眼婆娑地想念她的弟弟。有些岁月，有些事，不能让它轻易过去。不遗忘不代表放不下仇恨，它提醒我们时时警醒，时时铭记，如今和平幸福来之不易。



当我听到这段历史时，清晰地感受到，作为艺术家的梁耀南已经被革命的火焰点燃，他与家人眼中的安生生活彻底告别。

在接下来的十年生命里，梁耀南把自己燃烧得更为彻底。

由于历史的原因，梁耀南的个人遗物和档案资料极为稀少。即便如此，我们也能从老梁的口述和有限的史料中感受九十年前那个生命的澎湃激情。1932年至1933年间，他受上海共产党组织派遣多次回到家乡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革命者的使命感和骨子里的抗争性格，使得梁耀南在这片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火焰。他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兴建金清闸的工人。他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宣传减租减息。他雷霆般的革命行动最终激怒了地方势力，在遭受多次围捕、革命工作无法开展后，他转战上海。

1937年淞沪会战后，梁耀南再次回乡，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家乡。他响应全国文联“文化工作者回乡为抗日服务”的号召，成立全县性抗日救亡团体。中共温岭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梁耀南任书记，温岭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铺开。这间位于金清港畔的百年木楼就是当时中共温岭县委的活动场所。抗日战争的猛火烈焰从这间两层木楼蔓延至温岭全境。他最终在这里彻底燃烧了自己的生命。

1941年冬，梁耀南因劳累过度离世，时年32岁。

此刻，他的生命终于安生了，在他点燃自己，照亮一直深爱的这片土地后。金清大港水波不兴。